

顶级“全球城市”营商环境的比较研究

——基于 SMILE 指数的分析

刘江会, 黄国妍, 鲍晓晔

(上海师范大学 商学院, 上海 200234)

摘 要: 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本文构建了一个评价尺度更“宽”、针对性更强, 能够更好契合“全球城市”发展需要, 能够反映大数据时代特征的营商环境 SMILE 指数。基于 SMILE 指数比较分析认为, 北京和上海在经济体量、经济成长性、数字政府、利用互联网和大数据提升金融服务效率方面与其他顶尖“全球城市”差距不大, 甚至具有一定的优势, 但在破产程序、中小企业投资者权益保护、办理施工许可效率、企业税负负担、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国际连接与拓展能力、金融支持创新创业、商务要素成本、数据安全等方面差距明显。当前, 北京和上海优化营商环境的着力点在于: 在金融会计准则、投资贸易规则、市场准入与监管以及货币的可兑换性等方面先行先试, 尽快使得一些基础性经济金融制度与国际接轨, 提升“全球连接指数”和拓展国际市场的可能性; 在规范化的前提下, 大力促进新金融业态、新金融模式、新金融工具的发展, 整合各种科技金融服务要素, 为企业创新提供“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支撑。

关键词: 营商环境; 城市社会环境; 市场环境; 创融环境; 法制环境; 政务效率; SMILE 指数; 城市发展

中图分类号: F291.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462X(2019)08-0147-10

一、引 言

国内外营商环境评价报告诸多, 目前最具影响力的是世界银行发布的《营商环境报告》(Doing Business)。从 2003 年起, 世界银行对全球一百多个经济体的营商便利度进行打分排序, 至今已公布了 16 期。世界银行在评估“营商环境”时采用了一个相对窄的尺度, 即主要从“营商程序便利程度”与“法律保障力度”两个维度评估。世界银行评价体系的核心是保障企业建立、运营和

发展壮大的制度环境和法制环境, 重点是公平的市场环境。然而, 企业在评估一个城市的营商环境时, 不仅关注营商的便利性和法律保障力度, 更看重这个城市的经济体量、成长性、潜在的商业机会、要素(人才、资金)的可得性、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可达性、环境资源的承载力等^{[1][2][3]}。因此, 仅参照世界银行标准来优化营商环境显然是不够的。

有鉴于此, 本文在吸收现有营商环境评价方法中合理成分的基础上, 从城市社会环境、市场环境、创融环境、法制环境和政务效率五个维度构建评估城市营商环境的 SMILE 指数。根据影响因素与企业营商关联程度的大小, SMILE 指数将企业营商因素分为核心层因素、中间层因素和外围层因素, 并根据影响力的大小赋予权重, 这为分析比较全球主要城市的营商环境提供了一个更加客观全面的评价体系, 为打造国际化、法治化、便利化、规范化、电子化的良好营商环境提出了富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我国上市公司透明度空间分布的非均衡性及其传染性问题研究”(71573178); 上海市决策咨询重点项目“营商环境的国际比较研究”(2017-A-120)

作者简介: 刘江会, 1971 年生, 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副院长、教授, 经济学博士; 黄国妍, 1974 年生, 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副教授, 经济学博士; 鲍晓晔, 1983 年生, 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副教授, 经济学博士。

二、国内外营商环境指数的梳理与评价

目前,国内外已有多份研究报告对全球主要国家(地区)和城市的营商环境进行评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世界银行发布的《营商环境报告》,国内一些研究机构也发布了专门性的营商环境报告。此外,在很多国际研究机构发布的城市竞争力报告中,也涉及一些与营商环境相关的指标,如

日本森纪念财团都市战略研究所发布的“全球城市实力指数”(GPCI),经济实力指数中两个指标与营商环境相关。下表1对现有的营商环境评价指标进行了梳理。世界银行在《2019年营商环境报告:强化培训、促进改革》报告中称,中国“在中小企业改善营商环境方面取得快速进展”,排名由第78位跃升至第46位。这反映在过去一年我国在改善营商环境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

表1 国内外营商环境评价报告

	主要营商环境评价报告	样本范围	主要评估指标
营商环境专项评估报告	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	对全球100多个经济体的营商环境进行打分排序	10项一级指标(开办企业、办理施工许可证、获得电力、登记财产、获得信贷、保护中小投资者、纳税、跨境贸易、执行合同和办理破产)权重均为10%;二级指标41项
	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2017世界城市营商环境评价报告》	经济总量排名靠前国家的25座城市,加上中国的香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共30座城市	软环境、生态环境、市场环境、商务成本环境、社会服务环境、基础设施环境
	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中国分省企业经营环境指数》	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包括台湾、香港、澳门、西藏)	政府行政管理、企业经营的法制环境、企业税费负担、金融服务、人力资源供应、基础设施条件、中介组织和技术服务、企业经营的社会环境
	报告名称	样本范围	报告中涉及营商环境的指标
全球城市竞争力报告中的营商环境指标	普华永道《机遇之都》	全球30座主要城市,包括中国的上海和北京	营商便利度(开办企业、办理破产、免签证国家数量、外国使馆和领事馆数量、保护中小投资者、气候风险应对、劳动力管理风险和税收效率)
	日本森纪念财团都市战略研究所《全球城市实力指数排名(GPCI)》	全球44座城市,包括中国的香港、北京和上海	商业环境和营商便利度(工资水平、人力资源保障、办公空间、公司税率和经营风险)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全球城市竞争力报告》	全球505座样本城市,包括56座中国城市	营商便利度(世界银行)、犯罪率、语言多样性

对全球主要城市的营商环境进行分析比较,世界银行指标适用性存在不足,原因有以下三点。

一是针对对象主要是内资中小企业^[4],对于以“全球城市”为目标定位的城市而言,世界银行指标具有局限性。下页表2列举了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调查样本企业的特征。定位于“全球城市”,就不仅要关切如何为中小型企业营造一个便利、高效、安全和公平的营商环境,还要考虑大

公司尤其是跨国公司对营商环境的要求^{[5][6]}。对于在全球配置资源的跨国公司而言,其对于一个城市营商环境的关注点与中小企业会有所不同,其可能更加关注城市的腹地支撑、链接全球产业链的能力、在全球城市网络体系中的连通性,以及经济体制框架的一些基本构成要素与国际准则的兼容性等^{[7][8]},但在世界银行评价体系中并没有包含这些因素。

二是评价尺度“窄”,评价结果与实际经验存在一定差距。世界银行评估“营商环境”时采用了一个相对较窄的尺度,即主要从“营商程序便利程度”“法律保障力度”来评价,忽略了经济体量、成长性、潜在商业机会、宏观经济稳定性、要素的可得性、资源承载力等重要因素,导致评价结果存在偏差。如以北京和上海为样本城市,2018年世界银行报告评价的中国营商环境排名(第78位)低于非洲的卢旺达(第41位)和南美的哥伦比亚(第59位),这与实际明显不符。

三是评价指标没有考虑大数据时代的新特征,无法反映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下企业对营商环境的新要求。世界银行评价指标体系主要是对传统经济下企业进入市场的情况进行评估,反

映了企业生命周期各环节的运行效率。但没有考虑大数据时代企业发展的新特征、对营商环境的新要求。如世界银行评价指标体系在评估企业融资环境时,是从传统金融的角度来评估企业获得资金的可能性,没有考虑利用金融创新,高效、可控地服务于初创企业的新金融业态和新金融产品(如天使投资、风险投资和PE、公司创投、科技银行等因素对初创企业的金融支持),也没有考虑将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等高新技术全面应用于支付、清算、融资等领域对金融服务效率以及对企业融资成本的影响。实际上在大数据时代,金融和科技的融合程度,对企业的融资环境具有重要的影响^{[9][10]},但是从世界银行评估体系中并不能看到这一点。

表2 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调查样本企业特征

筛选样本企业标准	样本企业特征
1.企业所有人	100%国内公司且归5人所有,没有一个所有人是法律实体(即都是自然人)
2.启动资金	人均收入的10倍
3.经营范围	从事一般性工业或商业活动,例如生产或向公众销售产品或服务。企业不从事外贸也不经营须遵守特别税制的产品,不使用重污染的生产过程
4.办公条件	租赁商业厂房或办公室,不是房地产所有者;办公区域的年租金等于1乘以人均收入;整个办公室的面积大约为929平方米
5.雇员人数	经营一个月内,雇员数量至少有10个、至多有50个,且雇员全部都是本国公民
6.营业额	营业额至少达到人均收入的100倍

三、指标选取、数据来源与测算方法

鉴于上述世界银行评估体系的局限性,本文在借鉴国内外有益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营商环境SMILE指数。相较于世界银行评估指标体系而言,SMILE指数评价尺度更宽,纳入了世界银行评估指标没有考虑的诸如经济体量、成长性、潜在的商业机会等指标。同时SMILE指数更好地契合了“全球城市”的目标定位,不仅考虑中小企业对营商环境的关切,还考虑了在全球配置资源的跨国公司尤其是先进生产性服务业(APS)对营商环境要求的指标。此外,SMILE指数还增加了“智慧城市指数”“金融科技和科技金融”指标以反映大数据带来的重大影响。

(一) 指标选取

SMILE指数将影响企业营商环境的因素归结为五个方面,即社会环境(Society Environment,简称S)、市场环境(Market Environment,简称M)、创融环境(Innovation & Finance Environment,简称I)、法制环境(Legal Environment,简称L)和政务效率(Efficiency of Administrative Environment,简称E),为了突出该指标体系的辨识度,我们根据这五大类因素的英文首字母缩写,将该指标体系命名为营商环境“SMILE指数”。根据这五类一级指标,在每类指标下,进一步构建了二级和三级指标。我们还根据与企业经营环境关联度的大小,将SMILE指数的五大维度指标分为外围层指标(社会环境指标)、中间层指标(市场环境指标

和创融环境指标) 和核心层指标(法制环境指标

与政务效率指标) ,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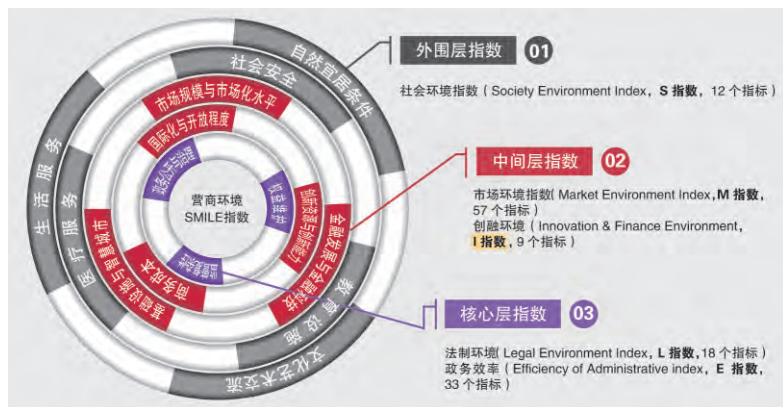


图 1 营商环境 SMILEs 指标体系示意图

（二）数据来源与样本城市

SMILE 指数的各项指标与数据均来自国际权威机构与组织的报告或数据库,包括世界银行、世贸组织、OECD、国家统计局、中国社会科学院、福布斯、普华永道、德勤、森纪念财团等国际组织、政府机构或权威专业机构发布的数据和报告(由于版面原因,各项数据具体来源不一列举)。

关于哪些城市是顶尖“全球城市”现有研究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但多数研究认为在“全球化和世界城市”(GaWC)城市竞争力排名中居于Alpha++和Alpha+级别的城市可以被界定为顶级“全球城市”^{[11][12]}。这些城市包括伦敦、纽约、巴黎、东京、新加坡、中国香港。因此,本文就以这些城市作为北京和上海的对标城市,分析比较北京和上海与这些城市在营商环境方面的差距。

（三）指标权重的确立与指数的测算

营商环境评价是一项涉及多层系统、多项指标的复杂工作,权重的确定是此类研究工作的重点。本文采用客观赋权法中因子分析法对全球城市营商环境进行测算和综合评价。一是对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为了使数据具有可比性,我们首先对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采用直线型标准化处理方法;二是根据相关系数矩阵对原始指标进行相关性判定,并进行 KMO 和 Bartlett 的球型度检验,以判断是否适用因子分析;三是提取主因子,根据方差贡献率 $\geq 85\%$ 的原则确

定因子个数,并对初始因子载荷矩阵进行旋转,得到旋转之后的因子载荷矩阵,比较每个原始变量在各个主因子上的载荷;四是得出因子得分系数矩阵,计算每个主因子的得分,并以主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权重进行加权平均计算因子总得分,并进行排名。

四、基于 SMILE 指数的顶尖“全球城市”营商环境比较分析

(一) 综合指数比较

我们选取了国内外 8 座城市,根据 SMILE 指数,对其进行了测算和排序,结果显示纽约、伦敦位列前两位,上海和北京 SMILE 指数综合排名靠后,分列第七位和第八位(见下页表 3)。

表 3 还列出了 8 个样本城市在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指数中的得分和排名情况,不难发现,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分列第一位和第二位,而在 SMILE 指数中,纽约和伦敦分列第一位和第二位。可见,当考虑社会环境、市场环境和融创环境,并将反映经济体量、国际链接与拓展、金融支撑和创新等指标纳入营商环境指数后,纽约、伦敦、巴黎和东京等超大经济体的首位城市营商环境相对排名均会上升,而较小经济体城市,如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则排名下降。北京、上海的排名虽然没有变化,但与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的差距缩小了,而与纽约和伦敦的差距扩大了。

表 3

营商环境综合指数及分项指数排名

SMILE 综合指数得分与排名				世界银行营商环境综合指数得分与排名		
城市	得分	排名	相对于世界银行排名的变化	城市	得分	排名
纽约	100.00	1	↑	纽约*	82.54	3
伦敦	92.96	2	↑	伦敦	82.22	4
新加坡	87.93	3	↓	新加坡	84.57	1
巴黎	84.00	4	↑	巴黎	76.13	5
东京	82.45	5	↑	东京*	75.68	6
香港	68.27	6	↓	香港	83.44	2
上海	55.75	7	→	上海*	65.29	7
北京	43.70	8	→	北京*	65.29	7

注: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指数包括 180 个经济体,一般一个经济体都选择最大商业城市作为样本城市,以该城市的营商环境指数代表该经济体的营商环境指数;而人口超过 1 亿的超大经济体是以前两个最大商业城市的营商环境指数按人口权重进行加权平均得到的。因此,在表 3 中世界银行营商环境综合指数得分排名中,带* 号的城市实际上是其所处经济体的营商环境指数。

(二) 核心层指数比较

参考世界银行的营商环境评价体系, SMILE 指

数的核心层指标纳入了营商法制环境指数和政务效率指数,但与世界银行指标略有不同(见表 4)。

表 4

SMILE 指数核心层指标与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价体系的异同

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价体系		SMILE 指数核心层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法律保障力度	获得信贷、执行合同、保护中小投资者、办理破产	营商法制环境指数	世界银行法律保障力度相关指标,加上知识产权保护指数、人身安全指数
程序复杂性	开办企业、办理施工许可、获得电力、财产登记、纳税、跨境贸易	政务效率指数	世界银行程序复杂性相关指标,加上数字政府指数、政府治理指数、政府透明度指数

表 5 SMILE 指数核心层指标得分与排名

城市	营商法制环境指数得分与排名		政务效率指数得分与排名	
	得分	排名	得分	排名
新加坡	100.00	1	93.37	2
香港	37.53	6	100.00	1
纽约	74.71	2	86.38	3
伦敦	60.38	3	85.89	4
巴黎	50.73	4	68.24	5
东京	45.63	5	51.16	6
上海	21.92	7	23.85	7
北京	14.51	8	22.97	8

差异主要表现在:其一,与世界银行的法律保障力度相关指标相比,营商法制环境指数在世界银行指标的基础上加入了知识产权保护指数和人身安全指数;其二,与世界银行程序复杂性相关指标相比,政务效率指数在世界银行指标的基础上加入了数字政府指数、政府治理指数和政府透明度指数,以衡量政务公开和政府治理水平。表 5 展示了主要“全球城市”营商环境 SMILE 指数核心层指标得分情况。

1.核心层营商法制环境指数比较分析。就 SMILE 营商法制环境指数得分而言,新加坡综合得分遥遥领先排名第一位,纽约、伦敦、巴黎、东

京、中国香港、上海和北京位列其后 相对于领先城市 ,上海和北京的营商法制环境仍有明显差距。世界银行法律保障力度相关指标测算的城市排名为纽约、新加坡、伦敦、中国香港、东京、巴黎、上海和北京 ,两个排名有些许差异。上海和北京的排名相对而言没有变化 ,但是其与领先城市的得分差距有所拉大 ,这表明当考虑更加全面的营商法制环境标准后 ,北京、上海与全球顶级城市的差距更加明显。我们还测算了北京、上海营商法制环境的各分项指标与样本城市中表现最好城市之间的差距(如图 2 所示) ,不难发现缺乏规范高效的破产程序、对中小投资者的权益维护不足和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较弱是北京、上海营商法制环境建设的主要短板 ,而执行合同的效率和社会治安是北京和上海的相对优势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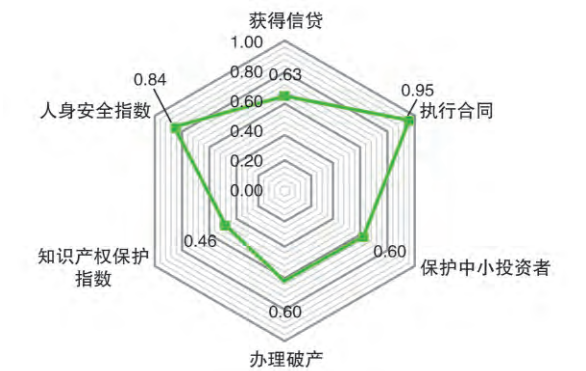


图 2 北京、上海与表现最好城市营商法制环境指数各分项指标的相对分值

2.核心层政务指数比较分析。就 SMILE 营商环境政务效率指数而言 ,中国香港、新加坡的政务效率分别排名前两位 ,纽约、伦敦、巴黎、东京紧随其后 ,上海、北京位列第七位和第八位。两种测算方法下的城市排名差异并不大 ,只是基于 SMILE 政务效率指数评价下 ,纽约排名上升一位 ,超越伦敦位列第三位。但是我们看到 ,北京、上海与表现最好城市中国香港、新加坡的距离拉大了。从 SMILE 政务效率指数的各分指标评价来看(如图 3 所示) ,办理施工许可效率低、企业税负较重、政府信息透明度较低是北京、上海提高政务效率面临的主要瓶颈。而在数字政府指数方面 ,北京和

上海与领先城市非常接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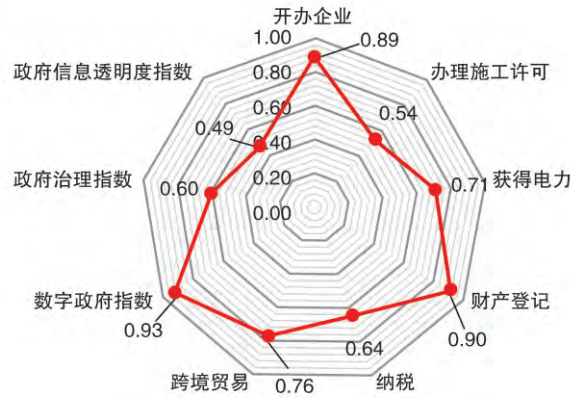


图 3 北京、上海与表现最好城市政务效率指数各分项指标的相对分值

(三) 中间层指数比较

SMILE 指数在测度营商环境时 ,加入了市场环境指数和创融环境指数作为中间层指标。表 6 展示了样本城市 SMILE 营商市场环境指数和创融环境指数得分的基本情况。

表 6 SMILE 指数中间层指标得分与排名

城市	营商环境指数得分与排名		营商创融环境指数得分与排名	
	得分	排名	得分	排名
纽约	100.00	1	100.00	1
巴黎	82.13	2	67.18	4
东京	64.80	3	83.69	3
伦敦	64.68	4	96.34	2
新加坡	56.06	5	51.96	6
香港	36.09	6	59.56	5
北京	8.62	7	46.69	7
上海	7.45	8	35.61	8

1.中间层市场环境指数比较分析。就市场环境指数而言 ,纽约市场环境综合实力最强位列第一位 ,巴黎、东京位居其后 ,北京、上海的市场环境综合实力与其他领先城市相比差距较大。从市场环境指数的各分项指标来看 ,上海在营商基础设施条件、经济增长性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 ,北京与上海一样在经济成长性方面优势明显 ,而营商

基础设施条件方面存在差距(见图4左),但是与国际领先城市相比,北京、上海全球配置资源的能力不够强、国际拓展力相对不足(表现为全球城市网络中心度较低)、经济自由度有待进一步提升(如图4右所示)。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 SMILE 市场环境指数

中,与其他领先“全球城市”相较,上海和北京的营商要素成本过高(见图5),劳动成本、资金成本、房价、水电成本都相对较高,使得企业经营负担较重,削弱了城市的营商环境竞争力,因此如何有效降低商务成本是北京和上海营造一流营商环境的一个关键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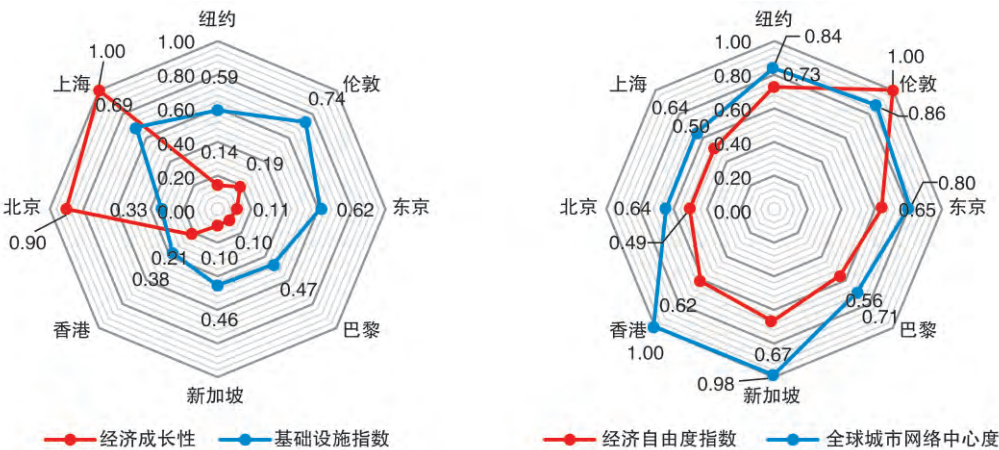


图4 顶级“全球城市”SMILE 指数中间层市场环境部分指标比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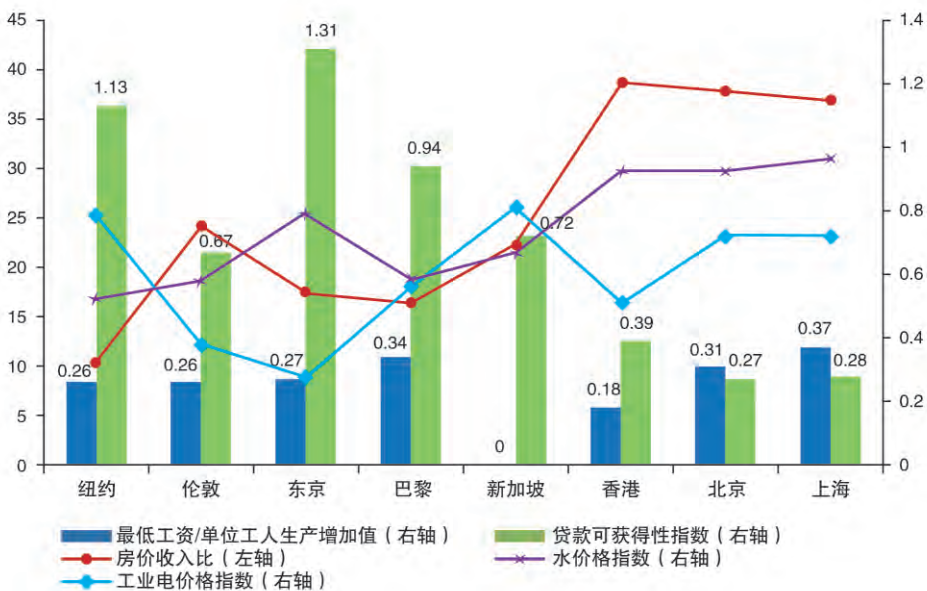


图5 国内外城市主要商务成本对比

注1: SMILE 营商环境指数用最低工资/单位工人生产增加值作为劳动力成本的代理指标(该指标越大表示劳动力使用成本越高)、贷款可获得性指数作为资金使用成本的代理指标(该指标越低表明资金使用成本越高)、房价收入比作为居住成本的代理指标(该指标越大表明居住成本越高)

注2: 数据来源: Doing Business Database、<http://www.numbeo.com/property-investment/rankings.jsp> 《2017 年世界城市营商环境评价报告》。新加坡无最低工资制度,故其最低工资/单位工人生产增加值指标为 0

此外,SMILE 营商环境指数还纳入智能停车系统公司发布的《2017 smart cities index》相关指标,从 4G 连接、Wi-Fi 热点覆盖、手机普及、网速

等四个维度对全球主要城市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评价,结果显示,北京、上海的 4 项指标与其他城市相比仍有明显差距(见表 7)。

表 7 国内外主要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比								
指 标	纽约	伦敦	东京	巴黎	新加坡	香港	北京	上海
数字生活指数	8.66	6.52	7.76	8.26	7.66	6.44	4.98	4.2
4G LTE	6.74	4.34	6.37	7.26	8.71	7.17	4.6	4
Wi-Fi Hotspots	9.91	9.83	9.57	9.5	6.63	7.92	8.62	6.88
Smartphone Penetration	8.17	6.68	8.61	8.1	7.55	3.71	3.71	3.71
Internet Speed	9.83	5.24	6.5	8.18	7.75	6.97	2.99	2.21

数据来源: 2017 smart cities index 智能停车系统公司

2.中间层创融环境指数比较分析。作为顶尖的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纽约、伦敦的创融环境指数得分遥遥领先,东京、巴黎、香港、新加坡、北京、上海分列其后。在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城市对研发者的吸引力、智力资本与创新力、金融与科技的融合度(金融科技指数)是科技创新型企业最为关切的营商环境因素,也是创融环境的关键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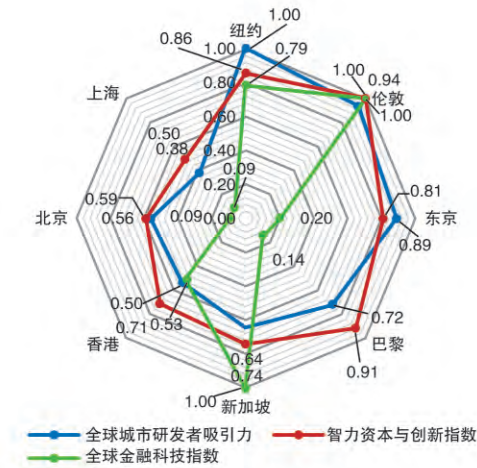


图 6 SMILE 营商环境中间层指标创融环境的比较

在 8 个城市中,纽约和伦敦的表现非常突出(见图 6),纽约能够成为仅次于硅谷的美国第二大科创中心,伦敦能够成为欧洲第一大科创中心,与这两个城市优越的创融环境高度相关。虽然北京、上海在利用互联网和大数据提升金融服务效率方面表现不凡,在第三方支付、金融云、区块链、

生物钱包等方面甚至居于领衔地位,但是,金融对科创型尤其是初创型企业的支撑力度却显不足,尤其是在服务于创新创业的天使投资、风险投资和 PE、知识产品产权证券化、股权众筹等方面不如领先城市突出。这是导致北京和上海创融环境滞后的重要原因。

(四) 外围层指数比较

商业活动的主体归根结底在于“人”,因此一流的营商环境不仅体现在高效的政府服务、高质量的法制环境、市场环境和创融环境,也体现在良好的社会环境。为此,SMILE 指数在测度一座城市的营商环境时,加入了社会环境指数作为外围层指标。

下页表 8 展示了国内外主要城市社会环境指数综合得分的基本情况,伦敦排名第一位,“艺术之都”巴黎排名第二,东京、新加坡、纽约、香港、上海和北京位列后六位。与其他城市相比,北京和上海在文化环境方面差距也比较明显,主要原因在于数据安全指数欠佳。安全的数据信息环境不仅可以有效保护个人隐私、商业秘密,对于营造公正、公开、透明的营商环境至关重要。经济学人杂志发布的《Safe city index 2017》报告从数据安全、健康安全、基础设施安全和人身安全四个维度对全球 60 座城市的社会安全情况进行了评价,报告显示,北京、上海的健康安全、基础设施安全和人身安全表现良好,但是数据安全与领先城市差距明显。

表 8 顶尖“全球城市”SMILE 营商环境外围层社会环境指数

城 市	综合指数		分项指数			
			宜居环境	社会安全	医疗服务	文化环境
伦敦	100.0	1	328.3	82.0	67.8	333.1
巴黎	99.5	2	350.5	79.7	73.1	217.3
东京	97.0	3	332.8	89.8	79.0	186.3
新加坡	80.7	4	290.1	89.6	69.6	180.9
纽约	78.5	5	280.0	89.0	63.5	233.1
香港	55.7	6	275.6	86.2	63.8	105.9
北京	22.2	7	284.8	72.1	64.1	155.0
上海	20.5	8	273.6	70.9	59.7	124.0

五、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鉴于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价指标尺度偏“窄”,评价结果与经验差距大;针对对象主要是内资中小企业,无法契合全球城市的目标定位,同时评价指标没有考虑大数据时代的新特征,无法

反映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下企业尤其是创新型初创企业对营商环境的新要求等局限性,本文构建了一个评价尺度更“宽”、针对性更强、能够更好地满足全球城市需要、反映大数据时代特征的营商环境 SMILE 指数。

表 9 基于 SMILE 指数视角的北京、上海营商环境总体评价

评价维度		北京、上海的相对优势及其与顶尖“全球城市”的差距
核心层指标	营商法制环境	相对优势: 执行合同效率高、社会治安水平良好 短板: 缺乏规范高效的破产程序、对中小投资者的权益维护不足、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较弱
	政务效率	优势: 财产登记效率较高、数字政府建设成效显著 短板: 办理施工许可效率低、企业税收负担较重、政府信息透明度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
中间层指标	市场环境	优势: 营商基础设施相对完善、市场广阔、经济具有高成长性 短板: 全球配置资源能力不够强、国际拓展力相对不足、商务要素成本过高
	创融环境	相对优势: 利用互联网和大数据提升金融服务效率方面表现不凡,在第三方支付、金融云、区块链、生物钱包等方面甚至居于领衔地位 短板: 金融对科创型尤其是初创型企业的支撑力度却显不足,尤其是在服务于创新创业的天使投资、风险投资和 PE、知识产权证券化、股权众筹等方面不如领先城市突出
外围层指标	社会环境	相对优势: 公共交通设施相对完善,在健康安全、基础设施安全和人身安全表现良好 短板: 自然宜居质量相对较低、数据安全水平亟待提升、公共服务供给效率有待提高

基于该指数,本文将北京、上海与顶尖“全球城市”的营商环境进行了分析比较,并得到如下主要结论:其一,与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指数相比较,SMILE 指数在增加考量社会环境、市场环境和创融环境后,超大经济体的首位城市营商环境的

相对排名均会上升,而较小经济体城市排名下降。北京、上海的排名虽然没有变化,但与新加坡和香港的差距缩小了,与纽约和伦敦的差距扩大了。其二,对于定位为“全球城市”的北京和上海而言,在经济体量、经济成长性、数字政府、利用互联

网和大数据提升金融服务效率方面与其他顶尖“全球城市”的差距不大,甚至具有一定的优势,但在破产程序、中小企业投资者权益保护、办理施工许可效率、企业税负负担、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国际连接与拓展能力、金融支持创新创业、商务要素成本、数据安全等方面差距明显,上页表9从三个层次五个维度对北京和上海营商环境进行了归类总结。

基于上述主要结论,本文就北京和上海如何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提出以下三点政策建议。

第一,对于北京、上海而言,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亟须完善评价体系。对标纽约、伦敦等顶级全球城市,北京和上海最主要的差距是没有产生像毕马威(KMPG)、波士顿咨询(BCG)、高盛(Goldman Sachs)这样业务遍布全球的本土型先进生产性服务企业(APS),导致为全球提供“服务”的能力不足,制约了在全球城市网络体系中的竞争力和辐射力。可见如何营造一个有利于跨国经营的先进生产性服务业的营商环境,对于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城市非常重要。

第二,在深化“放管服”改革过程中,对照世界银行标准,围绕“营商程序便利性”与“法律保障力度”为企业开办、扩建、经营、破产清算提供良好的环境,是北京、上海在优化营商环境过程中要达到的基本要求。更重要的是还要着力在金融会计准则、投资贸易规则、市场准入与监管以及货币的可兑换性等方面进行先行先试,尽快使一些基础性经济金融制度与国际接轨,提升“全球连接指数”和拓展国际市场的可能性,这样才能打造一个与“全球城市”定位相契合的营商环境。

第三,在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能否为企业提供便利的创新和融资环境是评估一个城市营商环境质量的关键因素。北京和上海都提出要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因此,如何在规范化的前提下,大力促进新金融业态、新金融模式、新金融工具的发展,整合各种科技金融服务要素,为企业创新提供“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支撑,既是北京和上海优化创融环境的一个重要着力点,也是实现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目标的重要推动力。

参考文献:

- [1] EI-hadj Bah, Lei Fang, “Impact of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on Output and Productivity in Africa”, *SSRN Electronic Journal*, Vol.114, No.7, 2011, pp.1-59.
- [2] 董志强、魏下海、汤灿晴《制度软环境与经济发展——基于30个大城市营商环境的经验研究》,《管理世界》2012年第4期。
- [3] 钟飞腾、凡帅帅《投资环境评估、东亚发展与新自由主义的大衰退——以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为例》,《亚太经济》2016年第12期。
- [4] 罗培新《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估方法论:以“开办企业”指标为视角》,《东方法学》2018年第6期。
- [5] 龚柏华《国际化和法治化视野下的上海自贸区营商环境建设》,《学术月刊》2014年第1期。
- [6] 李猛《营建粤港澳大湾区良好法治营商环境——以对接国际高标准投资贸易规则为视角》,《当代经济管理》2018年第1期。
- [7] Susanne Frick, Andrés Rodríguez-Pose, “Average City Size and Economic Growth”, *Cambridge Journal of Regions, Economy and Society*, Vol.9, Issue2, 2016, pp.301-318.
- [8] 李玉梅、桑百川《中国外商投资企业营商环境评估与改善路径》,《国际经济评论》2018年第9期。
- [9] Peter Wood, “Service Competitiveness and Urban Innovation Policies in the UK: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London Paradox’”, *Regional Studies*, Vol.43, No.8, 2009, pp.1047-1059.
- [10] 熊励、王锬、许肇然《互联网支撑上海全球城市竞争生态优势提升研究》,《中国软科学》2018年第9期。
- [11] Peter Taylor, Ben Derudder, *World City Network: A Global Urban Analysis*, London: Routledge, 2016 (second edition).
- [12] Peter Taylor, Michael Hoyler, Kathy Pain, Sandra Vinceguerra, “Extensive and Intensive Globalizations: Explicating the Low Connectivity Puzzle of US Cities Using a City-dyad Analysis”, *Journal of Urban Affairs*, Vol.36, Issue 5, 2014, pp.876-90.

[责任编辑:曾博]